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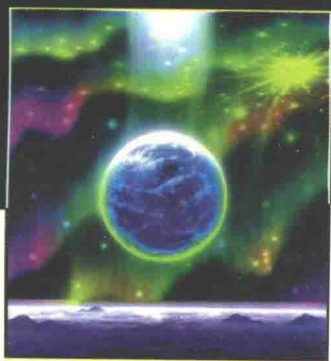


SHIJIFENG CONGSHU

世纪风丛书 包亚明 主编

文学 的 文化含义

李书磊 著



生于六十年代

学人批评文丛

李书磊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文学的文化含义

李书磊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丛书策划 唐继无
责任编辑 唐继无
装帧设计 王月琴

文学的文化含义

李书磊 著

| | | | |
|----|-------------------------------------|----|-----------------|
| 出版 |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编 200233) | 开本 | 850×1168 1/32 |
| 发行 | 上海远东出版社 | 印张 | 8.75 |
|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千字 | 235 插页 2 |
| 排版 | 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 版次 |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
| 印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 印次 | 1998 年 2 月第 1 次 |
| | | 印数 | 1-5100 |

ISBN 7-80613-699-1 / G·583

定价: 15.00 元



李书磊

李书磊，男，1964年生，河南原阳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2年毕业，同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4年底毕业分配至中央党校工作，1986年考回北大读中文系现代文学博士生。1989年底回中央党校工作至今，现为中央党校文史部副主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著作有《都市的迁徙》(1993)、《为什么远行》(1995)、《杂览主义》(1996)、《重读古典》(1997)、《1942：走向民间》(1997)等。

目 录

| | |
|-----------------------|----|
| 关于我们这一代人 | 1 |
| ● 文化立场 | |
| ● 共同经验 | |
| ● 知识传统 | |
| ● 代际差异 | |
| 文化的徘徊 | 7 |
| 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 | 9 |
| 论市场化进程对文化人的影响 | 25 |
| “人文精神”的真实含义 | 45 |
| 文化的无用之用 | 53 |
| 文学的流变 | 59 |
| 谢冕与朦胧诗案 | 61 |
| 余秋雨评点 | 72 |
| 散文作为一个问题 | 78 |
| 权作裁判 | 87 |
| 诗与读诗的实验 | |
| ——冯至三首十四行诗解析 | 95 |

KAI 46/07

| | |
|------------------------|-----|
| “走向世界”之病 | 104 |
| 短论两则 | 108 |
| 昨日本文 | 113 |
| 论《班主任》的局限性 | 115 |
| 在《海的梦》的“达观”背后 | 125 |
| 《北方的河》精神分析 | 131 |
| 《新星》的英雄主义基调批判 | 139 |
| 《爱,是不能忘记的》叙述观察 | 147 |
|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接受检讨 | 155 |
| 《你别无选择》矛盾阅读 | 163 |
|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文化测量 | 170 |
| 少年文章 | 177 |
| 漫论“样板戏”的文化含义 | 179 |
| 生命的省悟 | |
| ——林庚诗读解 | 196 |
| 批评的语言进入 | |
| ——对一个技术性问题的回溯与分析 | 205 |
| 观念的进步与艺术的成熟 | 214 |
| 论乔良小说的实验意义 | 223 |
| 徐星和陈建功的重叠形象 | 231 |
| 从“寻梦”到“寻根” | 239 |
| 历史与未来的精神产儿 | |
| ——论新时期“青年文学体” | 253 |
| 后记 | 272 |

关于我们这一代人

- 文化立场
- 共同经验
- 知识传统
- 代际差异

我们这一茬人不像我们的兄辈那样有很强的一体感，因为他们在一起吃过很多苦而我们却不然。当然我们也没有在一起享福，只是所苦各异罢了。我们的经历较兄辈有了一点多样性，在精神上也就多成了散兵游勇。所以“关于我们这一代人”我不敢说什么，只能就我自己的情况交代几句。或许可以从我们各自的状况中概括出这一代人的共性，但这种麻烦事让好事的人去做吧。

先说一下文化立场。立场当然是现代文化的立场，鲁迅的立场。我很小就读鲁迅的书，虽不能完全理解但也深受熏陶，早成了复古派和保守派的敌人，10岁就写了不少痛骂孔老二及其弟子徒孙的大批判稿。上大学后读了外国的书，在更广大的背景上理解了现代文化的本质，更成了现代和现代化的信仰者；虽然在思想上否定了“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那个时代，但对孔学的敌视态度却没有改变，并且在一种后人看来或许会有点费解的逻辑下把“批林批孔”和孔学视为一家。这样现实批判也纳入了反传统话语。现代化的理想是反传统的动因，在这种理想之下市场经济和民主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90年代市场经济真的来了，却使我们尴尬起来。原来市场经济竟和拜物风尚、消费主义孪生，这和我们的人生期望格格不入起来。“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四海为家穷苦地生活几十年”，我们从小受的是英雄主义教育，应该说这种教育很入骨；思想或可转变，但骨子里的东西却很顽固。我们本来是要做英雄的，即使从文也是“拿起笔，作刀枪”，现在却让我们做一个市民；呼吁市场经济时我们还是英雄，怎么它一来我们就不是了。当然市场经济也有英雄，但那是商人而不是文人；或者文人中也有成为偶像和英雄的，但那都是大众消费性文化的生产者，本质上也是商人。陌生的社会状态使我们有强烈的不适感。在这种被迅速异己化的境遇中我们重温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的理论觉得倍感亲切，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批判也颇得我心。在新的理论觉悟下，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其实不完全是传统甚至主要不是传统，它是现代的制度形式的一种。苏东集团解体之后，人们的意识形态意识有所冲淡而民族观念则不断增强，这时候文化之中客观上隐含的国家利益指向也日益被发见，于是我们面对西方文化的心情复杂起来，至少不再有从前那种单

纯的狂热了。而且而立已至，寻根和寻找精神皈依的心慢慢地生出来，对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学、对作为母语的汉语竟开始耽溺。此时此刻再来看自己的少年文章已不无遥远之感。

不过，无论如何，我对现代和现代化的信仰没有改变。个人的感性遭际可以通过个人反省超越，思想所接受的纷扰也可以通过冷静的思虑逐渐澄清。我最终还是坚信，中国和中国人只有走向现代才有生机，才是生路。对现代批判理论的接受只会使我们以更丰富、更健全因而也更坚定的心态来接受现代。我认识到母语和古文代表了我們作为人的一种需要，而现代性也同样代表了我們作为人的一种需要甚至还是更重要的需要。并且由于现代化已经成为不可更易的世界潮流，如同时间的一维流动一样不可更易，所以拥护或者反对现代化的问题已经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伪问题。让古文和古诗所代表的一切成为疗治并安慰我們现代痛苦的药和酒吧！让我们的现代痛苦在现代的不断演进中获得最后的拯救吧！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是既来之、则安之，对中国走向现代的这个混乱而不宁的必然过程报以会心。

实际上前面说“立场”的时候已经说到了“经验”，二者本不可分，“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经验”。既然前面说的是些乏味的经验，下面就说些有趣的经验吧。

我的小学是在河南省原阳县韩董庄公社破车庄学校上的。“破车庄”这个村名很朴实，意趣盎然。一年级时在地上用粉笔写字，其中的一句话是“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当时我苦恼于其中的“奇”和“夺取胜利”的“夺”不好区分。记得当时还会背许多毛主席诗词。由于跳级很快升入初中，是1974年。初一的时候为了歌颂“新生事物”写了一篇小说叫《朝阳》，写学生为了创办一个木工组 and 一心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校长之间

的斗争，共分十部分，一万多字。我哥哥当时是学校的民办教师，他把这篇小说刻印了一百份到处散发。其中一份发到了县文化馆，文化馆奇之，请我过去谈话，于是我第一次进了县城。文化馆给我讲了许多要深入生活的道理，留我住下来修改这篇小说准备在《原阳文艺》上发表。我住在一幢旧楼二楼朝北的一间很小的房间里，边改小说边看着窗外淅沥的秋雨落在狭小的天井里，落在对面墙跟几棵石榴树上，很有一种背井怀乡的惆怅与忧伤。当时被列为“新生事物”的事很多，除了学生参加劳动还有赤脚医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等等，其中还有一项是寡妇再嫁。我在报上读到一篇寡妇再嫁的报道，不知怎样地灵机一动就将其改编成了快板书，有一百多行，居然都押韵合辙，被贴上了墙报。一个十岁的学生写快板歌颂寡妇再嫁其轰动性仅次于寡妇再嫁本身，老师当然是夸奖，同学们却难免私下起哄，好在“不怕讽刺打击”也是当时的“革命精神”之一，我也就“硬着头皮顶住”了。我就是这样开始我的文学生涯的。后来我又写了不少批林批孔的儿歌和评《水浒》、批宋江的文章，还写了歌颂秦始皇和李逵的诗，涉及的面还是很广的。初二的时候是1975年，又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让在县中教学的父亲给我借了四卷一套的《列宁选集》，淡红色的封面新崭崭的，一不小心就在上面留下了手痕。列宁的文章长的多，我专挑短的读。不久传达了中央文件，上面有毛主席的话：告诉春桥、文元同志，要写文章，要出大字本。张、姚的文章很快发表，姚文为《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文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字数均以万计。我慕其文风，发愤将它们都背诵下来了。张、姚的句式在我写文章批判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诬蔑新中国”的影片时倒是借用了不少。可惜安东尼奥尼不懂中文，对当时中国罄竹而书的批判文章无法欣赏。初中的两年是我批判文章的高产时代，批

上了瘾就连同班的落后同学也捎带上了，连连写《致某某同学的公开信》，结尾多为“我们要在你的背上猛击一掌：同志，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云云。当时我读得最熟的作者是列宁、毛主席、鲁迅、浩然、张永枚以及张、姚。

1976年9月9日，我高中入学。这一天正是毛主席逝世的日子，因而高中第一节课是全班抱头大哭。10月，“四人帮”被捕，就又开始揭批“四人帮”。不过，这是结束“革命大批判”的最后一批。不久全国学校教育就转入中断了10年后的正常状态。1977年高考恢复，使我有个人的切实目标，在这一点上我们永远感念邓小平，当时叫“邓副主席”。1978年我应届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

下面就该说到“知识传统”了，这就更加个人化了。我大学读的是图书馆学系，四年本科对我最有用的大概算是目录学和古籍整理方面的训练了。由于喜爱文学就系统地旁听中文系的课。旁听很好，有听课之乐而没有考试之苦。1982年大学毕业时顺利考取中文系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跟着张钟、谢冕先生读书。1986年工作一年多后又考回北大中文系读严家炎先生的博士生，学现代文学。再毕业时正值80年代末年，不知何种机缘使我忽发思古之幽情，开始专心钻研中国的古典文学。在古文学方面我工作单位中央党校文史部的刘耕路先生对我有很多指教，不是导师，胜似导师。可以说中国文学是我的知识基础。

在文学方面我用力最勤、也较有影响的领域是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从1983年起开始发表评论文章。由于着重于新时期文学，因而对它的重要影响源西方的现代文学和哲学有过着重的学习，这种学习在80年代中文系学生中比较普遍。外国的古典文学多是泛泛而读，但唯对俄罗斯文学有入骨的热爱，托尔斯

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其文其情对我精神和趣味的影响或许不亚于母语中的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这一点又同我们老师那一辈人，即50年代的大学生有点相似，我告诉他们这一点时他们都有一些惊讶。

八九十年代学术思潮纷纭，作为身历者自有不少耳食，但迄今为止我治学的基本态度和方法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在治学方向上，我打算由文学而入文化，由文化而通历史。目前读外国现代文史哲作品的兴趣很浓，立志多读原文原版，以求不受别人欺负。

最后要作几句“代的评价”了。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比较无用，不如上一茬人（40年代末、50年代出生者）有经历；也不如下一茬人（70年代出生者）有学问。据说“中国可以说‘不’”就是我们这一茬人搞出来的，据说这几位勇士又在对我们的上一茬人说三道四。他们的行为使我深感羞耻。上一茬人或许有缺点，但他们所有的缺点我们也全有，他们的优点我们则未必有。我的10年大学生活都与上一茬人同窗，对他们很了解也很尊重，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往往是从同学身上学到的比从老师那儿学到的多。甚至可以说整个七八十年代我们就是跟着上一茬人学文化、闹革命的，去轻薄他们只能显示我们自己的轻薄。

总而言之我对我们自己不抱太大希望。但若努力不辍，虚心向前后两代学习，会有些出息也说不定。

文化的徘徊

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

当前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变，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些具有共同性质又属不同层次的社会变动同时发生，必然伴随着阵痛性的剧烈冲突。外在的结构性冲突——如实务部门与精神部门、沿海与内地、下一代与上一代之间——而外，还存在着内在的心理冲突，这后者或许比前者更重要。这种心理冲突不仅影响着一个人当下的社会行为，而且也关系着一个人与情感、信仰有关的终极皈依。作为一个文化与历史研究者，认真搜集这些社会心理资料，并用历史主义立场分析整理，是认识当前社会乃至认识人性本身的绝好机缘。而知识分子，由于他们从事精神劳动的职业性质，由于他们近百年来曲折而痛苦的阶层命运，他们的心理在当前尤其表现出特殊的丰富性，因而成为最恰当的研究标本。毋庸赘言，对知识分子心态的研究同时也是研究者灵魂的自我认知，而这种自我认知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一、理想归位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起因于西化教育机构——新式学

校的出现,新的教育内容以及大规模的出洋留学传给他们朦胧的西化意识,这种朦胧意识在本世纪初明确为“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实际上,由于各种条件(如战乱、匮乏)限制,“科学”并没有成为知识分子尤其是文科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和实践,20年代胡适所倡导的实证主义学术方法响应者寥寥,30年代茅盾所倡导的科学主义小说创作(自然主义)也成空谷足音。然而,“民主”几十年间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顽固概念,导源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运动和文化创作、学生运动和政治革命都或明或暗地张扬着民主的旗帜。“民主”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已远不仅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它的所指已远不只是社会的政治组织方式,它成为一个容纳一切现代价值诸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个性主义的“空筐”或“箭垛”。“民主”成为知识分子情感与理想的寄托,成了一种宗教性的意识形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就与失败、光荣与耻辱都同对“民主”的追求直接相关。“五四”运动固然被看作民主的胜利,而50年代扩大了“反右”运动也被许多知识分子看作自己为“民主”所作的牺牲。

由于中国古代深厚的政治专制主义传统,由于在中外对比中对中国落后状态的强烈感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渴望,这种对“民主”的夸大性认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种意念确实对推动中国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民主”成了一种非理性的情结,被当成了解决中国问题唯一的、永远的、可以随手拈来的药方,因而它也限制了知识分子对中国现实细致的观察与研究,限制了知识分子思想的深入与深刻,以至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庸俗而僵化的概念。在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社会现实面前,乞灵于“民主”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往往显得幼稚而不切实际。如果说知识分子因为争取“民主”所遭受的打击是一种悲剧的话,那么他们自身认识的肤

浅与偏差则加重了这种悲剧因素。

也许我们无法对知识分子一个世纪的精神史作出无懈可击的概括,但我们至少可以认定直到80年代众多知识分子的思维还局限于“民主—专制”的二元对立模式之中。这种模式的简单化、非理性特征不仅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禁锢,而且还诱发了一种更为严重的思想错误,即制度拜物教和文化拜物教。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这种思想轨迹:当清朝的封建统治面临危机的时候,知识分子选择的是变法;当变法失败之后,他们选择的是议会民主制度;当议会民主在实施中被歪曲变成闹剧和丑剧的时候,他们把原因归咎于中国文化的不适应,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反孔反儒、文化启蒙当成落实民主制度的最终途径。“五四”直到80年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停留在这种认识水平上,由此就可以理解80年代蔓延于知识界的“文化热”的原因,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重复的不过是“五四”时代文化启蒙的思想和词汇。我们看到这些认识没有例外地把视野局限于上层建筑领域,基本上忽略了作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因的经济基础。它没有看到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没有看到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和经济主体状态对政治和文化不可逾越的决定作用,没有看到社会经济条件的生长和发育过程是缓慢而且漫长的,因而它也就不能带来对历史进程的清醒和坦然。80年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改革进度不切实际的期望正是这种认识盲点以及由此带来的急躁病的反映,他们想通过“体制—文化”变动一下子完成现代化任务,他们想走的是一条由政治和文化拉动经济发展的捷径。

只是在90年代知识分子才开始普遍觉察到了历史真相。越来越生动、越来越健康的经济生活闯入他们的视野,给他们的思想带来了解放性的启发,使他们捕捉到了中国现代化也即是实